

○ 盖金香(天津)



青年周恩来曾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少年初识梁启超

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这一年梁启超等为了“广民智振民气”而发起维新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此后,梁启超创办刊物、开办学校、出版书籍,并在1902年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梁启超的声望以及“那支笔端常带感情的健笔”,使读过他文章的人很容易受到他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1910年,12岁的周恩来来到沈阳东关模范小学读书,读到梁启超的文章时,深受感染。据周恩来回忆:十几岁在沈阳读小学时,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

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容易懂。

那么,周恩来当时读了梁启超的什么文章呢?史料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周恩来同时代人的阅读史中可略探一二。据同时代人钱穆先生讲,自己自从能够独立思考以来,便一直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那就是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后来,16岁的钱穆读到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中的“中国不亡论”,心灵上受到巨大震动。同时代人左舜生也提到,自己和一位同学夜读梁启超这篇两万四千字的长文,竟欲罢不能而热泪长流。

那么12岁的周恩来是否也读到过这篇文章并生发强烈的爱国情感呢?答案大概率是肯定的。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虽然

在青年中也有很大影响力,但是由于梁启超的文章运用了介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新文体,通俗易懂,广受欢迎,更能对青年学子产生影响。周恩来就这样初识了梁启超。

有缘天津来相会

1913年,周恩来辞别民族危机深重的大东北来到天津,梁启超也恰恰于此期间在京津地区活动。

“乘桴岂是先生志,衔石应怜后死心。”梁启超在海外流亡14年,团结海外华侨共同推动维新变法,其精卫填海之心历历可见。在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应国内各方要求,结束流亡生涯回归祖国,开始了新的学术和政治生涯。

1913年秋,周恩来经过将近半年的准备,考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当时社会恰值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惨遭失败,梁启超等人正从事议会政治。由于梁启超的政治态度温和、政治行动谨慎,处处与被人视为“暴民”的国民党表现不同,且代表了多数人的心声,因此颇为舆论所重。

梁启超不仅是舆论界和政界的风云人物,在教育界中也颇受欢迎。周恩来所在年级的课表,就将“梁任公(梁启超号任公)文”列为“时文”,即类似于今天学校学生的必读书目。比周恩来高一年级的校友黄钰生曾回忆,在南开学校“课外读物,完全自由,我不记得学校对我们有什么禁令。我们班里有看梁启超主撰的《庸言》的。”《庸言》正是梁启超回国后在天津创办的报纸。据梁启超后来回忆,那时他“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当时,报纸还是“新媒体”,有识之士通过“新媒体”来传播自己的思想,造成舆论,往

往产生很大影响。《庸言》报中的言论,当时就对周恩来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5年,袁世凯走向复古专制的道路,梁启超逐渐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便不再支持他。当年9月,梁启超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发起反袁舆论。他撰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无情地揭露袁世凯口是心非、狡诈阴险的罪恶行径,“其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蔡锷语)。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当日,《京报》《国民公报》因发表或转载此文而销售一空。

不只是在舆论上造势,梁启超还和弟子蔡锷策动云南首义,亲自投身护国运动中。

当梁启超叱咤风云时,周恩来还只是南开学校的一名学生,但与众不同的是,他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学生,能够用政治眼光观察社会、把握未来,因此他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性质有深刻认识。于是,他和天津的爱国学生一起追随反袁大军,投入政治斗争。

当我们翻开南开学校的校刊《校风》,赫然可见1916年周恩来的一篇题为《中国现实之危机》的演讲稿。在文章中,周恩来抨击时弊,指出当前的危机是“因政治之不良,有以致百事之停滞”,拳拳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溢于言表。

和梁启超的一面之缘

1917年1月31日,寓居津门的梁启超应校长张伯苓的邀请,来到南开学校演讲。修身班上,周恩来和同学老师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了梁启超的演讲,在没有录音笔的时代,周恩来用洋洋洒洒四千言将梁启超的演讲整理成《梁任公先生演说记》一文,发表在《校风》上,并在结尾按以“记者识”：“任公先生,吾国舆论界泰斗,亦近代文豪也……”

共和初建,旋以失败告终,不能不令人感到失望。青年周恩来也没能超越时代,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动态:“对于政治,也是想去行那贤人政治的方法,排斥真正的民本主义。”其观点与梁启超此期一以贯之的“贤人政治”、开明专制论显然异曲同工。

1917年夏,周恩来决定赴日求学。此时恰逢张勋复辟、政局纷乱,梁启超、段祺瑞等于马厂兴兵以讨之,梁启超因而再次成为公众敬仰的对象。

在此历史背景下,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所作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就难说没有一点梁启超的影子了。因为就在20年前,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曾写下“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前路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求学。这是他与留日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这样的诗句。

旅日期间,周恩来也没有完全摆脱梁启超的影响。从他的《旅日日记》中我们看到,梁启超的语录常被引为座右铭,如“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等等。此外,周恩来还不间断重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梁启超进行心灵对话。可以说,此时周恩来仍然深受梁启超的影响。

1918年1月23日,周恩来在《旅日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早上在报纸上看到昨天日本国会的情况非常感慨。现在我国还没有国会,将来不管是新国会还是旧国会都没有能力。人民的水平、常识总是这个样子,怎样才能拥有优秀的国会呢。做官的人有几个真正在为国家着想呢,想起来真的很可怕。晚间我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要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学还没有求到门,竟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3月21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又写道:“今天晚上……菜做着的时候,我打开梁任公所编《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来念。这篇传记,我已经读过多少次,中间虽有多少错的地方,大概与英文、意文的传记差不了什么。我在西洋伟人传记中,最爱的是加富尔,所以每次读《三杰传》,心里头总觉有一番感慨。这次读这个传记,是我到日本来头一次。在日本有上半年



1919年,南开大学首届招生96名,第六排左一为周恩来

的阅历,所以读的时候,感触的地方益发添了许多。”《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是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时撰写的关于意大利资产阶级复兴运动领导者马志尼、加里波第和加富尔的书籍。周恩来欲借流放的马志尼,表达自己怀念祖国、拯救祖国的心意。

原本以为可以借鉴日本经验来挽救衰败的中国,然而实地考察后却发现此路根本不通。家国不幸,前路不明,下一步该怎么办?周恩来一时陷于沮丧、迷茫的情绪之中。

当年梁启超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交煎,内心焦灼无比,不惜以书生之身投身政治、力主变法维新。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饮冰室(“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何以解“内热”?唯有“饮冰”),以此比喻自己的忧虑。此时身处日本的周恩来,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内热”呢?

1919年春天,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笔录了梁启超的《自励》诗,赠予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

读书的南开同学王朴山:“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回国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成为五四运动中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1919年9月,周恩来进入南开大学(1919年由张伯苓创建)学习。之后他和学生各界志同道合者一起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从此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周恩来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梁启超正是既肯定传统、又求新求变的先贤,故而吸引了青年周恩来的目光,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追思梁启超先生博大的爱国情怀、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为人处世的高尚品格,追思青年周恩来虽年轻而思有为、仰慕先贤、追随先贤的胸襟怀抱,不禁感言,100年后,梁启超、周恩来华章不灭,浩气长存的精神仍可堪为现代青年的人生航向标。

(责任编辑:孔晓莉)